

目 录

前言	(1)
----------	-------

〔意大利〕

利玛窦 (Matteo Ricci, 1552—1610)	(1)
论中国民族性	
论中国思想	
论中国政治	
维科 (Giambattista Vico, 1668—1744)	(10)
论中国的文字及其他	

〔法国〕

尼古拉·马勒伯朗士 (Nicolas Malebranche, 1638—1715)	(14)
一个基督教哲学家和一个中国哲学家的对话	
孟德斯鸠 (Montesquieu, 1689—1755)	(32)
论中国的政体、法律、道德及其他	
魁奈 (François Quesnay, 1694—1774)	(46)
中国的自然法	
建立在伦理基础上的法律	
就中国政府的弊端问题与孟德斯鸠对话	
伏尔泰 (François - Marie de Voltaire, 1694—1778)	(61)
中国	
中国的历史	

卢梭(Jean - Jacques Rousseau, 1712—1778)	(73)
中国的科学艺术并不有助于敦风化俗	
雨果(Victor Hugo, 1802—1885)	(75)
圆明园	
罗曼·罗兰(Romain Rolland, 1866—1944)	(78)
《约翰·克利斯朵夫致中国兄弟们》的公开信	
对中国的看法	
评《阿 Q 正传》	
瓦莱里(Paul Valéry, 1871—1945)	(83)
中国和西方	
里奈·格鲁塞特(René Grousset, 1885—1952)	(92)
佛教的启迪	
中国思想的确定	
马尔罗(André Malraux, 1901—1976)	(111)
中国印象	
萨特(Jean - paul Sartre, 1905—1980)	(117)
对新中国的看法	
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 1908—1986)	(124)
中国印象	

〔德国〕

莱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 Von Leibniz, 1646—1716)	(129)
致德雷蒙先生的信：论中国哲学	
沃尔夫(Christian Wolff, 1679—1754)	(148)
关于中国人道德学的演讲	
康德(Immanuel Kant, 1724—1804)	(159)
中国	
赫尔德(Johann Gottfried von Herder, 1744—1803)	(165)
中国	

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 1749—1832)	(173)
论中国传奇	
黑格尔(G. W. F. Hegel, 1770—1831)	(177)
世界历史开始于中国所在的东方	
中国的道德和法	
中国的哲学和宗教	
中国的科学	
谢林(Friedrich Wilhelm Joseph von Schelling, 1775 — 1854)	(210)
中国—神话哲学	
韦伯(Max Weber, 1864—1920)	(240)
儒教和清教	
施韦策(Albert Schweitzer, 1875—1965)	(252)
中国思想与西方思想	
自我完善和自我奉献的伦理	
中国人为什么会接受佛教	
马丁·布伯(Martin Buber, 1878—1965)	(261)
道教	
赫尔曼·凯泽林(Hermann Keyserling, 1880—1946)	(283)
中国人的生命力	
中国人的道德	
中国人的礼节	
土地与农民	
儒教与新教之异同	
中国人的理想范式	
施本格勒(Oswald Spengler, 1880—1936)	(305)
文化形态与中国文化	
卡尔·雅斯贝斯(Karl Jaspers, 1883—1963)	(317)
孔子	
老子	

前 言

我们可以说,中国曾经创造过独步世界的伟大文化。这文化之中自然包括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很显然,对于当代的中国人来说,对属于我们自己的中国文化怎么评价是很令人感兴趣的问题。历史过程是辩证的,于是弘扬与批判也永远是一个文化主题。不过,本书并不是我们对中国文化的评价。我们饶有兴味的只是想和读者一起到一片新的天地里去:且听域外传来的关于中国文化的声音。之所以需要我们来听一听,还是中国的一句老话:他山石,可攻玉。

这一片新天地是这样的。我们很想知道在漫长的历史时期里,西方是如何看待中国的,东方其他民族又是如何看待中国的;我们很想知道中国过去和现在在世界各民族人民心目中的形象;我们很想知道我们中国文化与其他民族文化相比,异同点在什么地方。《中国印象》一书的目的就是力求满足人们这一方面的要求,通过介绍世界许多名人对中国的文化、历史、人民的看法和论述来使我们更好地了解中国和她的文化。

许多世纪以来,不少西方人、东方人都为着各自的目的注视着中国,写下了大量有关中国的论述。他们中有旅行家、商人、汉学家、传教士、政治家、学者、文化名人。可以说,外国人对中国的论述材料是汗牛充栋、浩如烟

海。因此无论从哪种角度对他们的论述加以介绍,都必然伴随着一个选材的过程。《中国印象》一书把其目光投在哲学家、历史学家、艺术家、作家、社会科学各学科的著名学者等世界名人的身上。我们这样做是因为这些世界名人们都具有渊博的知识,是世界文化的创造者和研究者,他们代表了本民族的最高文化水平,也代表了人类的最高知识水平,是在各自学科领域作出世界性贡献的人,因而可以断言,当他们把目光转向中国时,他们对中国的论述可能具有常人所不能达到的深度和广度,可能散发出人类智慧的光辉。

本书共收集 62 位世界名人对中国文化的论述,他们从各自的角度论述了中国文化的各个侧面,他们又都处在不同的时代,从而,我们可从他们对中国的论述中,了解到中国形象在世界历史上的变化。他们中有的超越了本民族文化的限制,从全人类的角度出发论述中国,因而,他们的论述有助于我们把握中国应如何走向世界、走向未来;他们中有的从他们各自的专业角度出发,对中国的某个问题进行论述,这种论述有助于我们研究中国本身。他们中大多都是从非中国人的角度来论述中国的,这种论述都具有比较研究的特色。所以,他们的论述又有益于我们的中西文化比较研究。他们中有的表达了对中国人民的热爱、同情、关切,给我们带来了别国民族的友情,他们的言语也成了中外关系史上珍贵的资料。当然,如同我们有局限性一样,世界性的名人也有他们各自的局限性,他们中也有些人对中国了解不深,其论述有肤浅之嫌,有些论述甚至带有作者对中国的偏见,对于这些论述,我们没有进行删节,意在保证资料的全面性,也使我们兼听则明。

本书没有收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对中国的论述,原因是因为他们对中国的论述已汇编成册出版了,再收集他们的论述,就有了重复之嫌。我们也没有收集许多汉学家对中国的有关论述,只有知名度极高的李约瑟除外,这样做是由本书的书名和特色所决定的。

全书的材料基本上都是作者的直接论述,只有萨特论中国的材料例外。那是一篇记者采访录。由于萨特对中国的直接论述成文极少(可能就没有),加之这一篇采访录又颇有特点,故加收录。

参加本书选编、翻译的人员主要是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的一群青年研究人员,同时也有一些外单位的工作人员参加。

本书的选编者是:柳卸林、何兆武、程钢、刘晓峰、董平、刘鑫、程捷。除董平是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人员外,其余均为本所工作人员。全书由柳卸林主编。

参加本书翻译的有:董平*、柳卸林、程钢、程捷、金丹实*、刘鑫、吴天波*、周恒*(加星号者均为外单位工作人员)。

全书译稿的校对人员是:柳卸林、董平、何兆武、刘鑫、刘晓峰(日文部分),另外,胡伟希也承担了本书部分译稿的校对工作。

应该指出的是编选本书的最初设想是由湖北人民出版社文史编辑部王建辉同志提出的,他希望我们青年研究人员能够承担起这样一本大书的选编、翻译工作。之后,这一工作列入了本所科研计划。

在本书的选编、翻译过程中,副所长钱逊教授对本书的编选工作给予了很多的关心和支持,我们还得到了刘桂生教授以及丁明、周东、蔡中、谭华、张金华、韩晓华等

同志的帮助,全所其他工作人员也对本书工作给予了各种各样的帮助,在此一并向他们表示感谢。

在成书过程中,全体人员尽了最大的努力,其中的艰辛就不一一细述了。由于学识、阅历有限,以及资料可得性的限制,加之时间仓促,我们在选编上,肯定遗漏了一些重要名人的论述,译文上也肯定存在错误之处,希望热心的读者能提出宝贵意见,以便在本书有机会出修订版时改正过来。

柳卸林

1990年10月

〔意大利〕

利玛窦

(Matteo Ricci, 1552—1610)

利玛窦是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早期重要的人物。他于1552年生于意大利中部的马赛拉塔城(Macerata),1571年在罗马加入耶稣会,1577年参加耶稣会的远东传教团,次年由葡萄牙乘船至印度,在印度停留4年。1582年他离印度来中国,相继在澳门、肇庆、韶州、南昌、南京和北京活动,主要是向朝廷和士大夫宣传天主教的义理以及介绍某些西方的科学技术知识。他在中国居住了28年,于1610年死于北京。他的主要著作有:《天学实义》、《畸人十篇》、《辩学遗牍》,以及翻译欧几里德《几何原本》(与徐光启合译)、《同文算指》(与李之藻合译)、《测量法义》(与徐光启合译)、《浑盖通宪图说》(与李之藻合译)等多种。

利玛窦在晚年还写过一部在中国的回忆录,目的是向他的西方同会教友介绍中国情况和他本人以及其他传教士在中国的经历。这部书在他死后由他的同会教友金尼阁(Nicolaus Trigault, 1577—1628),于1610年来华整

理出版,题名为《基督教远征中国史》(中译《利玛窦中国札记》,北京,中华书局,1983,两卷)。以下主要是从这部书中辑录的有关他对中国文化的评论。

论中国民族性^①

根据我们自己的经验,大家都知道中国人是最勤劳的人民,而且从以上几章可以很合逻辑地得出结论说,他们中间大部分人机械工艺能力都很强。他们有各种各样的原料,他们又天赋有经商的才能,这两者都是形成机械工艺高度发展的有力因素。只要提一下在这些工艺中中国人的做法看来与我们工匠的做法最为不同的一些方面,就足以说明他们的多才多艺了。应该指出,因为这里的人民习惯于生活节俭,所以中国的手艺人并不为了获得更高的售价而在他创作的物品上精益求精。他们的劳作是被买主的需求所引导的,而买主通常满足于不很精美的东西。结果,他们常常牺牲产品的质量,而只满足于表面好看以便吸引买主注目。这在他们为官员们做活时似乎特别明显,因为官员们根本不管所买物件的实际价值而只凭一时好恶向工匠付钱。有时候,他们还强迫工匠们去设计他们并无此聪明才智去做的东西。

(第 19—20 页)

我认为中国人有一种天真的脾气,一旦发现外国货质量更好,就喜好外来的东西有甚于自己的东西。看来好像他们的骄傲是出于他们不知道有更好的东西,以及他们自己远远胜于他们四周的

① 选自《利玛窦中国札记》,北京,中华书局,1981。——编者注

野蛮国家这一事实。

（第 23 页）

中国这个古老的帝国以普遍讲究温文有礼而知名于世，这是他们最为重视的五大美德（即仁、义、礼、智、信。——中译者注）之一，他们的著作中有着详尽的论述。对于他们来说，办事要体谅、尊重和恭敬别人，这构成温文有礼的基础。他们的礼仪那么多，实在浪费了他们大部分的时间。熟悉他们的风俗的人实在感到遗憾，他们为什么不摒弃这种外在的表现，在这方面他们远远超过所有的欧洲人。

（第 63 页）

因为他们不知道地球的大小而又夜郎自大，所以中国人认为所有各国中只有中国值得称羨。就国家的伟大、政治制度和学术的名气而论，他们不仅把所有别的民族都看成是野蛮人，而且看成是没有理性的动物。在他们看来，世上没有其他地方的国王、朝代或者文化是值得夸耀的。这种无知使他们越骄傲，而一旦真相大白，他们就越自卑。

（第 181 页）

论中国思想

中国所熟习的惟一较高深的哲理科学就是道德哲学，但在在这方面他们由于引入了错误，似乎非但没有把事情弄明白，反倒弄糊涂了。他们没有逻辑规则的概念，因而处理伦理学的某些教诫时毫不考虑这一课题各个分支相互内在的联系。在他们那里，伦理

学这门科学只是他们在理性之光的指引下所达到的一系列混乱的格言和推论。中国哲学家之中最有名的叫做孔子。这位博学的伟大人物诞生于基督纪元前 551 年,享年 70 余岁,他既以著作和授徒也以自己的身教来激励他的人民追求道德。他的自制力和有节制的生活方式使他的同胞断言,他远比世界各国过去所有被认为是德高望重的人更为神圣。的确,如果我们批判地研究他那些被载入史册中的言行,我们就不得不承认他可以与异教哲学家相媲美,而且还超过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中国有学问的人非常尊敬他,以致不敢对他说的任何一句话稍有异议,而且还以他的名义起誓,随时准备全部实行,正如对待一个共同的主宰那样。

不仅哲学家作为一个阶级是如此,就是统治者在过去的时代里也给予他以对一个人的最高敬意。然而,他却从未像神那样受到宗教式的崇拜。他们感激地承认他们都受益于他遗留下来的学说,甚至经过了这么漫长的时间直到今天,他的后裔仍受到大家高度的尊敬。统治者们给予孔氏家族的族长以世袭的尊荣并赋之以特殊的豁免权。

(第 31—32 页)

在这里每个人都很清楚,凡有希望在哲学领域成名的(指通过科举做官。——中译者注),没有人会愿意费劲去钻研数学或医学。结果是几乎没有人献身于研究数学或医学,除非由于家务或才力平庸的阻挠而不能致力于那些被认为是更高级的研究。钻研数学和医学并不受人尊敬,因为它们不像哲学研究那样受到荣誉的鼓励,学生们因希望着随之而来的荣誉和报酬而被吸引。这一点从人们对学习道德哲学深感兴趣,就可以很容易看到。在这一领域被提升到更高学位的人,都很自豪地实际上已达到了中国人幸福的顶峰。

我想更详尽地谈一下他们学习的这个方面,读者将感到既新

鲜而又有趣。被称为中国圣哲之师的孔子,把更古的哲学家的著作汇编成四部书,他自己又撰写了五部。他给这五部书题名为“经”,内容包括过正当生活的伦理原则、指导政治行为的教诫、习俗、古人的榜样、他们的仪礼和祭祀以及甚至他们的诗歌的样品和其他这类的题材。在这五部书之外,还有一部汇编了这位大哲学家和他的弟子们的教诫,但并没有特殊的编排。它主要是着眼于个人、家庭及整个国家的道德行为,而在人类理性的光芒下对正当的道德活动加以指导。这部书是从前面提到过的那四部书摘录下来的撮要,被称为《四书》(*Tetrabiblion*)。孔子的这九部书构成最古老的中国图书库,它们大部分是用象形文字写成,为国家未来的美好和发展而集道德教诫之大成。别的书都是由其中发展出来的。

在这个国家有一条从古代帝王传下来并为多少世纪的习俗所肯定的法律,规定凡希望成为或被认为是学者的人,都必须从这几部书里导引出自己的基本学说。除此以外,他遵循这几部书的一般内容还不够,更为困难得多的是他必须能够恰当而确切地按这几部书所包含的每一条具体的学说来写作。为此目的,他必须背熟整部《四书》,以便成为这方面的公认权威。与我们某些作者所说的情况相反,这里并没有教授或讲解这几部书的学校或公立学院。每个学生都选择自己的老师,在家里自费向他学习。

(第 34—35 页)

儒教是中国所固有的,并且是国内最古老的一种。中国人以儒教治国,有着大量的文献,远比其他教派更为著名。就个人来说,中国人并不选择这一教派。他们是在研究学问时吸收它的教义的。凡做学问有了名气的人或甚至从事学问研究的人,没有一个是再相信任何别的教派的。孔子是他们的先师,据他们说发现了哲学这门学问的乃是孔子。

(第 100—101 页)

儒教目前最普遍信奉的学说,据我看似乎是来自大约 5 个世纪以前开始流传的那种崇拜偶像的教派。这种教义肯定整个宇宙是由一种共同的物质所构成的,宇宙的创造者好像是有一个连续体(Corpus Continuum)的,与天地、人兽、树木以及四元素共存,而每个个体事物都是这个连续体的一部分。他们根据物质的这种统一性而推论各个组成部分都应当团结相爱,而且人还可以变得和上帝一样,因为他被创造是和上帝合一的。我们试图驳斥这种哲学,不仅仅是根据道理,而且也根据他们自己古代哲学家的论证,而他们现在的全部哲学都是有负于这些古代哲学家的。

(第 101—102 页)

儒家这一教派的最终目的和总的意图是国内的太平和秩序。他们也期待家庭的经济安全 and 个人的道德修养。他们所阐述的箴言确实都是指导人们达到这些目的的,完全符合良心的光明与基督教的真理。他们利用五对不同的组合来构成人与人的全部关系,即父子、夫妇、主仆、兄弟以及朋友五种关系。按照他们的信念,只有他们才知道如何尊重这些关系,而外国人则被认为是全然无知,或者即使知道也全不注意。

(第 104 页)

论中国政治

从远古以来,君主政体就是中国人民所赞许的惟一政体。贵族政体、民主政体、富豪政体或任何其他这类形式,他们甚至连名字都没有听说过。

(第 44 页)

如果我们停下来想一想,就会觉得非常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样一个几乎具有无数人口和无限幅员的国家,各种物产又极为丰富,虽然他们有装备精良的陆军和海军,很容易征服邻近的国家,但他们的皇上和人民却从未想过要发动侵略战争。他们很满足于自己已有的东西,没有征服的野心。在这方面,他们和欧洲人很不相同,欧洲人常常不满意自己的政府,并贪求别人所享有的东西。西方国家似乎被最高统治权的念头消耗得精疲力尽,但他们连老祖宗传给他们的东西都保持不住,而中国人却已经保持了达数千年之久。这一论断似乎与我们的一些作者就这个帝国的最初创立所作的论断有某些关系,他们断言中国人不仅征服了邻国而且把势力扩张到远及印度。我仔细研究了中国长达四千多年的历史,我不得不承认我从未见到有这类征服的记载,也没听说过他们扩张国界。正相反,我常常就这一论断询问中国博学的历史学家们,他们的答复始终如一,即情形不是这样的,而且也不可能是这样的。姑不论做出这种错误记载的作者声誉如何,错误之所以出现很可能是因为曾发现有中国人到过中国国境以外的证明。例如,人们可以引证菲律宾群岛,中国人曾打入那里的私人企业,但不是官方正式委派的。

标志着与西方一大差别而值得注意的另一重大事实是,他们全国都是由知识阶层,即一般叫做哲学家的人来治理的。井然有序地管理整个国家的责任,完全交付给他们来掌握。军队的官兵都对他们十分尊敬并极为恭顺和服从,他们常常对军队进行约束,就像老师惩罚小学生那样。战争政策由哲学家规划,军事问题仅仅由哲学家决定,他们的建议和意见比军事领袖的更受皇上的重视。事实上,这类意见很少,并且只有在罕见的情况下,是交给作战会议讨论的。因此,结果是凡希望成为有教养的人都不赞成战争。他们宁愿做最低等的哲学家,也不愿做最高等的武官,他们知道在博得人民的好意和尊重以及在发财致富方面,文官要远远优

于武官。更加令外国人惊异的是,在事关对皇上和国家的忠诚时,这些哲学家一听到召唤,其品格崇高与不顾危险和视死如归,甚至要超过那些负有保卫祖国专职的人。也许这种情操来自于:人们有了学问,心灵也就高尚了。也许还出于这一事实:从帝国建立开始以来,人们就更愿意学文科而不愿从事武职,这对一个很少或没有兴趣扩张版图的民族是更合适的。

(第 58—60 页)

大臣们作威作福到这种地步,以致简直没有一个人可以说自己的财产是安全的,人人都整天提心吊胆,惟恐受到诬告而被剥夺他所有的一切。正如这里的人民十分迷信,所以他们也不大关心什么真理,行事总是十分谨慎,难得信任任何人。出于同样的恐惧,近世的皇上也废除了公开露面的习惯。即使在以前,皇上离开皇宫禁地之前,不采取成千种防范措施他们也不敢外出。在这种场合,整个朝廷都处于军事戒备之下,沿皇帝要经过的道路以及与之相通的路上,都密布着便衣警卫。不仅人们看不见他,而且人们也无从知道在他的行列里很多轿子中他到底乘的是哪一座。人们会以为他是在敌国旅行,而不是在他自己的子民万众中出巡。

(第 94 页)

中国人把所有的外国人都看做没有知识的野蛮人,并且就用这样的词句来称呼他们。他们甚至不屑从外国人的书里学习任何东西,因为他们相信只有他们自己才有真正的科学和知识。如果他们偶尔在他们的著述中有提到外国人的地方,他们也会把他们当做好像不容置疑地和森林与原野里的野兽差不多。甚至他们表示外国人这个词的书面语汇也和用于野兽的一样。他们难得给外国人一个比他们加之于野兽的更尊贵的名称。人们简直难以置信,他们对于派来向皇上致敬或纳贡或办理别项事务的邻国使节

或使臣怀着多么大的疑惧了。虽然中国可能和派遣使节的邻国自古以来就友好相处,但这并不能使来访的贵臣免于他们在国内全部的行程中被当成俘虏或囚犯一样来对待,并不得在旅途中看任何东西。

(第 94—95 页)

何兆武摇选编

维摇科

(Giambattista Vico, 1668—1744)

维科是意大利哲学家、历史学家。父亲是一个书商，幼年在耶稣会办的一个学校学习，获得了一些古典学术方面的知识。他对柏拉图和塔西佗的作品很感兴趣。1697年29岁时，维科就任米兰大学的修辞学教授。他薪金低，生活困难，直到晚年才得到那不勒斯国王宫廷史官的职务和较高的待遇。但维科的身体已经很坏，在丧失了记忆力后不久便去世了。

维科的主要著作有：《论普通法的惟一原理》（1720年）、《论民族共同性的新科学原理》（1725年）、《新科学再编》（1730年）。《新科学再编》是在《论民族共同性的新科学原理》一书的基础上彻底修改而成的，这两部书是维科的主要著作。

维科认为历史发展是进化的，决定历史变革的是群众心理。

维科把历史划分为三个时代，即神时代，这是人类的原始状态；英雄时代，相当于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时代；凡人时代，相当于资本主义时代，此时平民登上历史舞台，创立新的民主制度。维科认为这三个时代的发展